

# 國父國民革命與臺灣之淵源 及影響之研究

林慶桐

## 壹、前言

民族的感情是最強韌的，血緣的結合是最長久的，在中國近代史上，無論是鄭成功所領導的反清復明義舉，以迄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始的國民革命運動，都跟台灣有極密切的關係。其間之相激相盪，桴鼓相應，始終如一，未嘗間斷，充分表現出台灣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世世代代，以心傳心，血肉相連，休戚相關的永恆民族情感。

九十年前，中日甲午戰爭，滿清戰敗，日本攫取了台灣的統治權。同樣是九十年前，國父建黨革命，誓復台灣。大陸仁人志士在國父的領導下，無不以恢復台灣為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使命。一批批有血性，有民族情感的同胞無時無刻不惦記著台灣這片領土和生長在這片領土上的骨肉同胞，而一次次拋頭顱、灑熱血，用行動來喚起民衆；收復失土的革命怒潮，終於石破天驚，風起雲湧，如排山怒濤，接踵而至。

國父孫中山先生是最早以實際革命行動恢復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考諸史實，源起於台灣的洪門會黨，啓迪了國父的革命意識，中法戰役，法軍犯台，促成了國父革命決心，而清廷割讓台灣，更導引了國父在廣州發動首次革命起義，可見國父致力國民革命與台灣實有深厚的淵源。國父在興中會宣言與勦立農學會徵求同志書上，皆以喪師賠款，割地求和為恥，明示恢復中華，收回失地的決心。辛亥革命，民國肇建，國父曾在南京發表談話，明確指出中國如不能恢復失地，即無法立國於大地之上。以後又數度發表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收復失地與利權的言論。一直到他在民國十四年彌留之前，仍念念不忘台灣的前途。同時，國父終其一生，為奔走革命，更曾三次蒞止臺灣，（註一）足見台灣這個大陸血

肉相連、休戚與共的寶島，在 國父的心目中是何等重要。

歷史的功用之一，在透過斑斑可考的文獻，讓年輕的一代與悠久光輝的過去發生親密的認同感，而不至於數典忘祖，欣逢 國父建黨革命九十週年，讓我們翻閱中國近代歷史，將 國父國民革命與台灣之淵源及影響，作一探討，作一回顧。飲水思源，遙想 國父，緬懷先烈，當知我們今日台灣在反攻復國的聖戰中，責任之重大，使命之艱鉅，能不感奮興起？實踐蔣總統經國先生的指示：「從光復台灣到由台灣光復大陸，讓我們為中華民族開創一個嶄新的時代。」這是本文寫作的主要目的。

## 貳、國父國民革命與台灣之淵源

在敘述 國父國民革命與台灣之淵源前，我們先探討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不論從歷史淵源，地緣因素，血緣關係，文化背景等各方面來看，台灣與大陸本來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體。

就歷史淵源來說，遠在漢代，國人對台灣已早有所認知與接觸。隋煬帝兩度派將率兵專征流求（台灣）。唐代航海造船業興，大陸東南沿海人民大批前來台灣沿海捕魚或從事貿易。元代立巡檢司於澎湖，定居之漢人為數不少。明代台灣成為國際貿易的轉繼站，漢人移墾者甚多，僅成年男子已達兩萬五千人，因此奠定漢人開拓台灣的基礎。至明季今南部嘉南平原已聚眾數萬，賴此有力之支持，所以鄭成功乃有驅逐荷蘭人，收復台灣之壯舉，而終成不朽之大業。

就地緣因素來說，地質學家認為台灣與大陸地塊於史前是連接在一起的，後因地層變動，始為淺海所隔，於是台灣成為中國東南大島。考古學家近在台東發掘：台灣島舊石器時代遺址已露痕跡，由其形態觀察，屬於北平周口店的系統無疑。可見中華遠古文化在台灣連接大陸時已推衍於此，較諸華南若干地區還要密切。而台灣西部已發現許多在台絕跡的象、犀牛等野獸的化石，也都出土於和大陸同一時代的地層中，或在此種地層所分布的地域之內。凡此種種，足以證明台灣與大陸原本同根，一衣帶水。

就血緣關係來說，誠如史學家連橫在台灣通史一書中所述：「台灣之人，中國之人也，而又閩粵之族也。」台灣同胞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炎黃子孫，是大陸同胞的手足，先民們渡大海，入荒陬，來到台灣，落戶成家，筆路藍縷，以啓山林。早期來自內地者，以閩粵兩省爲主，而以泉州最多，次爲漳州，再次爲粵東的客家人。抗戰勝利未幾，政府播遷來台，投入此一民族復興基地的；幾乎大陸各地同胞都有，台灣渡假蔚成中華民族之大熔爐。華夏裔胄，一脈相傳，民族至上，血濃於水。

就文化背景來說，長久以來，台灣與大陸同胞同樣地傳承了中原文化，「剛健中正，擇善固執」。無論表現在日常生活才面，如食、衣、住、行、育、樂等；民間習俗如逢年過節、婚喪喜慶，宗教信仰，社會禮儀等各方面，大多相同或相似。又如會講閩南語，對研究中原音韻大有助益，而台灣同胞的家譜及墓碑絕大多數皆註明祖籍，足以證明其來有自，源遠流長。

了解台灣與大陸本來是不可分割的一體，接著進一步研究 國父國民革命與台灣究竟有何關連；我們知道， 國父獻身革命事業，絕非由於一時興起，偶然衝動，而是經過長時間的醞釀，有其多方面的淵源，一般而言， 國父致力國民革命之緣由，可整理歸納爲兩大方面，十項理由：在客觀因素方面：則有地理環境的影響，歷史淵源與教訓，滿清苛政的憤慨，列強侵華的刺激，師友同志的贊助等五點；在主觀條件方面，則包括家庭背景的影響，人格形成與發展，學校教育的啓導，宗教信仰的助力和研習西學的獲益等，都是促成他一生爲革命奔走的主因。（註二）倘若我們純粹就與台灣的關係，來探討 國父國民革命之淵源，則可從下列三方面加以敘述：

### 一、洪門會黨，啓迪 國父革命意識

國父在自述中，自承革命思想之誕生，實緣於少時聽洪楊老兵講太平天國故事，而洪楊之初起，實憑藉洪門會黨的力量。所以 國父在民族主義第三講中曾說：「當洪秀全起義之時，洪門會黨多來相應，民族主義就復興起來。」（註三）可見洪門會黨對民族自覺意識與民族思想之發揚，有密切關係，對洪楊革命頗有推波助瀾之貢獻。而 國父早年革命思想，實多承襲洪門會黨與洪楊革命意識之啓發而發揚光大。所以 國父說：「民族思想，實吾先民所遺留，初無待於外鑠者也，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揚而光大之。」（註四）所謂先民，遠之，固可指周公、孔子以來「嚴夷夏之

防」的傳統思想。近之，當然以太平天國及洪門會黨給他的影響最大。但洪門會黨，這個啓迪 國父革命意識，保存民族思想的幫會組織，追源溯本，則與台灣有關。

洪門會黨，又名天地會，關於它的由來，史家說法不一，要以明末鄭成功初創於台灣，陳永華繼述其事之說，最爲有力。譬如 國父即認爲：「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同註三）陶成章「教會源流者」中亦云：「明室內亂，滿州乘之，再蹈亡國之慘，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塗炭，又結秘密團體，以求光復祖國，而洪門之會設也，指天爲父，指地爲母，故又名天地會，始倡者爲鄭成功，繼述而修整之者，則陳近南（案：即陳永華）也，凡同盟者皆曰洪門。」（註五）連橫亦以爲：「吾聞延平郡王入台之後，深慮部曲之忘宗國也，自倡天地會而爲之首，其義以光復爲歸。延平既沒，會章猶存，數傳之後，遍及南北，且橫渡大陸，浸淫於禹域人心，今之閩粵，猶大昌焉。」（註六）由上所引證，洪門會黨之組織，發源於台灣，而這個秘密結社，深入人心，散布在社會基層，他們的宗旨是「反清復明」。於是成了民族革命的種子，一面在台灣本土滋長，一面傳播到大陸迅速發展。而留台的洪門會黨，自清康熙至光緒二百年間，反抗滿清的革命起義，先後有林爽文、陳周全、楊兆謀、白啓、高夔、林永春、楊良斌、張西、林供、吳瑛、戴萬生、施九段等，大都直接間接與洪門有關。而由台灣發展到大陸的洪門組織，不但支持過乾隆前後的復明運動，而且影響到有清一代的抗滿革命。他們在實際的行動中，名稱雖有不同，宗旨乃一脈相承，依據滿清官方文書的記載，重要的起義事件有：（一）嘉慶十二年，清水會在江西起事。（二）道光十二年，會黨與兩廣及湖南苗族共謀叛變，大戰官軍。（三）咸豐三年，廈門會黨對官吏之不法起事，占領廈門。（四）與廈門之變同時，上海起事，會黨占領上海城。（五）道光三十年，三合會在兩廣各地蠶起，待洪秀全起事，其勢益張，延及閩、粵、贛、浙數省。（六）光緒十二年，廣東惠州府寧山三合會反抗清軍。（七）光緒廿四年，廣西南寧起事，除梧州、柳州外，全省悉入會黨之手，叛亂達十月之久。（八）光緒廿六年（西元一九〇〇年）三合會頭目鄭士良受 國父指揮，在惠州樹起革命旂，集衆二萬，不久失敗。

由於台灣與大陸洪門會黨的活躍，以及海外會黨組織的發展，及其會衆遍及馬來西亞、南洋群島、遠至暹羅、印度、檀香山等處，而 國父的家鄉，負山瀕海，久爲洪門活躍地區，流風所至，革命人才輩出， 國父耳濡目染，自然受到影響，革命意識，自然由此興起，他幼讀私塾，夤聞太平軍的退役老兵講述洪楊等革命故事，聽得津津有味， 國父在青少

年時期所接觸的師友多屬洪門中人，他的第一個革命同志鄭士良就是三合會的首領。後來他也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門，並居領導階層，所以常對海外洪門昆仲說：「你們都是老革命黨。」實因洪門乃是近代中國最大的革命集團，過去稱爲「秘密會社」，以現今的尺度衡量，就是一個革命黨。而國父領導國民革命，無論在組黨、捐款、起義，甚至宣傳各方面，洪門志士皆有相當的貢獻，所以辛亥武昌起義，一舉成功，水到渠成，這實在要追溯到兩百多年前在台灣的民族革命及洪門會黨。我們不能忘記，這把反清運動的聖火，是在明鄭時代的台灣基地點燃起來的，而辛亥革命之成功，確是鄭成功起義以來兩百多年民族運動的結果。宜乎對國父生平志業有深入研究的莊政先生認爲：「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孫文學說、中國革命史等重要著述中，均曾闡述洪門會黨的關係，並譽其爲老革命黨。蓋自明鄭創立洪門、馴至洪楊起義，以迄中山先生創始革命，前後革命的內涵雖然與時俱增，但在排滿興漢的民族大義上，則一脈相承，其來有自。」（註七）所以說洪門會黨，啓迪國父革命意識，就是這個道理。

## 二、中法戰役、奠定國父革命決心

國父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顛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同註三）國父爲什麼從這一年（光緒十一年，西元一八八五年，國父虛歲二十）決志革命呢？說來與台灣大有關聯。我們都知道，台灣經濟豐饒，天然資源富足，尤其在地理位置上論，「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此誠天以未闢之方輿，資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患。」（註八）台灣既是海防要地，更是東南四省安危所繫。然而當中國人民孜孜努力於台灣內部經營之時，正是西方勢力積極東漸之秋。中國的環境在變，台灣的外在情勢亦隨之變化。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國家時時貪涎台灣，有的欲開港通商，有的想借此爲對中國大陸活動基地，意欲局部或全部佔有，危機四伏，糾紛衝突不斷。列強侵略台灣，最有名的兩次，一次是牡丹社事件，一次則是中法戰役。一八七四年，東方日本公然大舉興兵犯境，不宣而戰，結果滿清政府爲保衛台灣疆土人民，委曲求全，接受英國調停，中日訂立條約，這一條約的訂立，滿清一方面默認琉球屬於日本，一方面則暴露了台灣的弱點，招致了以後日本對台灣的覬覦與侵略。中法戰役，則對台灣關係最大，不僅受到西方強國海陸軍的攻擊，真正淪爲正式戰場。結果政府不得不忍痛放棄了一個大的屬國越南，才解脫了台灣

的危機。

中法兩國爲越南問題爭執將近十年，至一八八三年，趨於嚴重，法國決心併有越南全境，包括北圻，威脅到中國南部邊防，雙方積極備戰，十一月，戰事爆發，越南被迫成爲法國的保護國，第二年，法軍擊敗中國駐防軍，清廷命李鴻章與法國艦長在天津訂約，承認法、越條約，並答應撤兵。唯當時在諒山駐守之清軍並不知情，法軍前往接收未成，反而重啓戰端。於是法軍分攻福州、台灣，在七分鐘內擊毀馬尾兵船十一艘，大破我南洋艦隊，接著攻打基隆砲台，數小時內砲台盡毀，法軍攻佔基隆，並封鎖台灣，於是清廷對法宣戰。開戰之初，法國海軍雖然獲得勝利，光緒十一年，清軍却在陸上大有斬獲，馮子材的軍隊在鎮南關，諒山大敗法軍，並節節進攻，越人也準備起來響應，此時法國國內，又因政事紛擾，政爭突起，無暇東顧，續派援軍實感困難，正想撤兵談和的時候，也恰爲中國收復失土，重振聲威的大好良機。可是清廷不此之圖，缺乏判斷事理之遠見，錯失復仇雪恥之良機，反而下令陸軍停止進攻，與法國議和，承認越南爲法國的保護國，並且開埠通商。戰勝國不惜割地求和，實亙古所未有，舉世所未見。其所以如此，相傳李鴻章與清廷實有不得已的苦衷；第一，中國的國力尙非法國之敵，海戰尤爲明徵，如果法艦北擾，將掣動全局。第二，日本乘中法失和，一再在朝鮮生事，一八八四年的漢城事變，更爲嚴重。李鴻章認爲日禍大於法患，朝鮮重於越南，必須及早了結法事，否則將陷於日法的夾攻。他認爲中國的大患，將在我東邊沿海之精華地區，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已是中國的眞敵，所以他主張集中國力，開發沿海及腹地各省，以鞏固國防。第三，亦爲最大原因，是爲了保全台灣。台灣自被封鎖之後，兵單器乏，接濟爲難，苦守艱撐，坐困數月，危如朝露，不幸發生意外，一失將不易收。即以陸戰而論，馮子材甫克諒山，孤拔即佔據澎湖，乘勝而收，可無大損，否則不惟全局敗壞，且孤軍深入，戰事益無把握，越南已全爲法有，縱再進步，終非中國所能有。越南不過藩封之地，台灣爲中國郡縣，海防要區，目前尙屬完璧，審量利害，權衡輕重，唯有犧牲越南，挽救台灣。但李鴻章萬萬沒想到，後來台灣竟在他手裡割讓給了日本，導致台灣同胞——幾百萬大陸同胞的手足，在異國的蹂躪下達五十年之久。

中法之戰、清廷和戰乏策，喪師失地，「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註九）國父因此受到莫大的刺激，他覺得清廷愚昧昏聩，不可救藥，適有法國兵

艦因攻打台灣，遭清軍還擊而損毀，乃往香港修護，詎料華籍工人集體反對，堅拒修理，以免兵艦修好後再去攻打祖國。此一愛國行動，使國父深深覺悟到清廷雖然腐敗，而民心可用；感到中國基層民衆潛力富厚，頗具民族大義，國家前途仍有希望。爲了挽救祖國於危亡，拯生民於塗炭，所以國父在中法之戰後，乃決心革命，要排滿興漢。

### 三、清廷割台、促成國父革命行動

革命乃順天應人，弔民伐罪的長期偉業，一個人由產生革命思想而導致革命行動，往往還要經過一段歷程，有人祇有革命思想，民族意識而無革命行動，有人則祇有革命行動而無革命思想。國父則兼而有之，他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也是一個傑出的革命家，如上所述，國父自小即受洪門會黨之影響，革命思想，醞釀很久，可是革命的決心，是中法越南新約簽訂之年（一八八五年）始確定的。而在中日戰後，才採行革命行動。原因是：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清廷對日本宣戰，滿清陸軍在朝鮮節節敗退，海軍在黃海也幾遭全軍覆沒，戰敗的局勢已經註定，以堂堂大國竟爲蕞爾小國日本所擊敗，國父憤清廷之張惶失措，痛國脈之不絕如縷，唯有創立革命團體，始能挽救危亡，遂過赴檀香山島，鼓吹活動，創立興中會，這就是中國國民黨最初的組織，迄至去年，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正是國父建黨革命九十週年。光緒二十一年，清廷被迫訂定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而清廷的專制昏庸，政治上的愚昧無能，貪污腐化，軍事上武備廢弛，毫無安內攘外的力量，文化思想上的抱殘守闕，故步自封，至此已暴露無遺，亡國的危機，至此也更加深刻。尤其在喪權辱國的條約中，竟將住著血肉相連的同胞，是先民慘澹經營的寶島——台灣割讓給了日本，給予國父的創痛最深，影響國父的革命事業最大。因爲「當乙未（一八九五年）讓台之前，國父雖已決定革命，然而還上李鴻章『萬言書』，陳救國大計，這事雖然不能看作與清廷妥協的行爲，但亦不能說是絕對沒有寄望於清廷的意思。及至乙未讓台後，繼興中會之設立，又有乾亨行、農學會等之秘密機關組織。這時國父革命意志之堅決及行動之積極，實非以前可比。事實上，那時之革命已走上實際行動了。」（註十）所以旋即在香港創設興中會總部，以擴大革命組織。而從那時起，隱然已將收復台灣列爲國民革命主要目標之一。這正由於「台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在地勢上，乃是中國安危存亡所屬的生命線，中國要講究真正的國防，要維護東亞永久的和平，絕對不能讓我們的台灣，永久統治在日本帝國主義

的手中，爲要達成我們國民革命，遏止野心國家擾亂東亞之企圖，必須針對著日本帝國主義積極的陰謀，以解救台灣之人民爲我們的職志。」（註一一）

民國前十七年，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中日訂立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已成定局，全國上下，悲痛不已，群情激昂抗議，輿論憤激，普天忠憤，民心解體。國父在親撰的興中會成立宣言上，無比沈痛地說：「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矇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在「農學會緣起」中也曾指出：「我中國衰敗至今，亦已甚矣！用兵未及經年，全軍幾至覆沒。喪師賠款，蒙恥啓羞，割地求和，損威失體；外洋傳播，編成談笑之資。」這時人民日益激憤，正是革命起義的最好時機，於是國父積極進行策畫與籌備，聯絡會黨和軍隊，以謀起義。根據歷史記載，甲午戰敗，乙未割台，台灣同胞紛起反對，在「無天可籲、無人肯援」之下，「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以武力抵抗日本的佔據，前仆後繼，歷時約半年，於九月四日終告淪陷，而國父策畫的第一次廣州之役，則起事於台灣淪陷後第六天——九月九日。事雖未成，革命起義，此起彼落，再接再厲，造成時勢，終有辛亥武昌起義之成功，這絕非偶然的。連戰在「近代的台灣」一書中曾提及：「一八七四年以後，台灣出現的事件層出不窮，其中一八八四年法國人進攻台灣爲不祥之兆，而一八九五年日本在台灣登陸更爲不幸。一八九五年台灣之終於淪入日人之手，無疑地觸發了祖國最嚴重的反響。事實上，中國近代革命的第一個火花即由孫逸仙博士在一八九五年——也就是台灣割讓與日本的同一年——在廣州所燃起，以剝極而復的觀點來說，決非一種巧合。」（同註八）由此可知，國父首次起義的動機，與中日之戰，顛覆之清廷，不可分割，而台灣的割讓予日本，更爲國父開啓了革命起義的契機，更是促成國父革命行動的主因，因此今日談國父國民革命與台灣的淵源，實有莫大的啓示與意義。

### 叁、國父革命對台灣之影響



國父爲了國民革命，不但派革命同志陳少白於光緒廿四年到台灣，成立興中會台灣分會，更三次親自來到台灣，第一次是在光緒廿六年九月，主要的工作是策畫惠州的起義。第二次是在民國二年八月，時當二次革命失敗之後。第三次則是在民國七年六月初，廣東革命失敗之後，「到台灣會會台灣同胞，發表意見，宣傳主義，喚起民族意識，鼓吹愛國精神。」（註十二）綜觀 國父三次來台時間，都是在革命最艱難困頓階段，又多半是 國父不見容於國內外其他地方之時，這的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環節，今日的台灣，已成爲反共復國的堡壘，是中國十一億同胞希望所寄之革命基地，這絕非偶然，細察起來，是有其歷史可尋。

國父生前三次來台，可見他對台灣是何等的重視，對台灣是何等的關懷，甚至當 國父在北京重病垂危的時候，仍念念不忘台灣同胞，關心台灣同胞的革命事業，戴季陶曾提到：「總理逝世前，我在北京侍疾，總理談及了日本有關的二、三重要事項：總理說：『我們對日本應該主張的問題，最少限度有三項，一是廢除日本和中國所締造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二是使台灣和高麗最低限度獲得自治。』這是 中山先生逝世前對台灣的遺言，他是臨死不會或忘被壓迫的台灣同胞的。」（註十三）的確，偉人的風範，更使台灣志士們受到不可言喻的精神感召，因此當 國父逝世之後，台灣同胞在日人暴力的壓制下，沒有顧忌，沒有猶疑，奔走呼號，如喪考妣。不斷舉行追悼會、紀念會等。北大台灣同學會更致送了一幅輓聯：「三百萬台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舍我輩其誰分擔！」詞意是多麼的悲切激揚，豪情更是千雲萬丈！ 國父逝世二週年，台灣革命青年團發表了一篇「敬告中國的同胞書」：「偉哉！孫中山先生，東方弱小民族之一的台灣，雖然也與中國同祖同宗，但是他們所受的痛苦和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蹂躪的慘狀，却超過祖國數倍。祖國現已進入革命發展的時期，我同胞應認清時潮，急起直追，來參加祖國的革命。我們每想念及台灣，便會聯想到我們的總理，他雖然已經逝世了，但是他偉大的精神，仍繼續在指導東方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三月十二日是我們中國民衆不能忘記的日子，同時也希望絕對不要忘記一八九五年甲午之役所失去的台灣。」（註十四）本章即就 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對台灣的影響，分從三方面加以探討：

### 一、喚起民衆——民族意識的覺醒與革命組織的成立

國父說：「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恢復民族精神，有兩個條件：一是能知，亦即喚起民衆，使能認清民族的危機；二是合群，亦即加強民族團結，結成一個大國族團體，共爲復興民族而奮鬥。」（同註三）恢復民族精神，必須喚起民衆。要抵抗異族的蹂躪虐待，要免除異族的欺凌壓迫，喚起民衆，更是首要之務，當務之急。而激發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情感的強烈希望，就是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對台灣的主要影響之一。

甲午戰後，日本雖因馬關條約強佔了台灣，但它却無法改變台灣同胞的民族精神與愛國思想。日本於割據台灣之初，即實施其嚴酷的殖民地統治，百般箝制具有民族意識的言論，並嚴格限制台灣同胞與祖國大陸的往來，希圖逐漸消滅漢民族的民族思想，以達其奴化、同化的目的，凡大陸來台同胞均受嚴密的檢查控制，民國二年八月，國父來台，日本當局即曾派遣憲警予以秘密監視，就是一例。另一方面，台灣同胞之欲往大陸者，依規定必需取得所謂「渡華彩券」，而申請此種彩券時，必須經過日警的詳細調查，手續繁瑣，麻煩極多，因此台灣同胞能獲准返回大陸遊歷或求學者，爲數不多，至於台籍青年之欲赴日本本土求學者，則又百般誘導鼓勵。因此自一九一一年後，在日本的台灣學生數目大增，到民國十一年前後，已激增到二千四百人，其後最多時曾超過三千人，這種現象，表面上似乎是台灣青年對日本有了「向心力」，代表了同化政策的成功，實際上却發生了日本人所意想不到的兩種現象；一是由於大多數留日學生均被安置於「高砂寮」（註十五），因而加強了台灣青年的團結，一是因爲此時中國留日學生的人數也大爲增加，造成了中國學生與台灣青年接觸的機會，而國父國民革命，宣揚主義，提倡人權，要求自由平等之主張，亦正是藉此管道在台灣青年腦海中滋長茁壯。由這兩種現象發展到最後，却得到一個相同的結果，那便是台灣青年民族意識的覺醒與反日思想的萌芽，日本當局之苦心積慮，却未料到此種措施，適所以與國父「喚起民衆」「民族團結」之號召不謀而合。

當時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一面受到辛亥革命成功的鼓舞，一面受到世界性民族自決的洗禮，同時又受到日本本土民本思想的薰陶，奮發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再加上朝鮮「三一事件」（註十六）的刺激，更使他們一變而轉爲實際行動，民國八年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首先有聲應會的組織。所謂聲應，意在響應國父國民革命運動與韓國獨立運動，聯合中，台以及韓國的有志青年，一致從事抗日革命運動，這是台灣愛國青年與祖國人士在日本國土內的第一次結合，也是台灣留日學生最早建立的團體，孕育了民族革命運動的胚胎。民國九年一月，更成立在台灣近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

新民會，新民會組成後，曾決定從三方面進行活動：(一)反對日本在台灣的苛政，由林獻堂要求撤銷「六三法案」(註十七)。(二)成立東京台灣青年會，出刊「台灣青年」，推蔡培火負責編輯，以擴大宣傳。(三)派蔡惠如、彭華英等回祖國大陸與中國國民黨取得聯絡。蔡於回國後，即往來於北京、上海、廣州間聯絡台籍志士，而在祖國求學的台籍青年這時也分別建立了反日的革命組織，民族革命的思潮乃日益高漲。上文提及，日據時代，台胞想回祖國，困難重重，因此台灣青年苦無機會回國讀書，至民國十一年以後，台灣失學青年日多而求學之心益切，有經由日本回國者，有得船員幫忙而潛渡者，其後逐漸增加，國內各大商埠均有台灣青年進入各級學校，這些青年，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瞭解最深，而本身感覺最切，他們開始與在東京的台灣革命團體，互相呼應，表現了很多次轟轟烈烈的殊死鬥爭，當時他們在祖國組織的反日革命性組織有：(一)北京的「北平台灣青年會」與「韓台革命同志會」。(二)上海的「上海台灣青年會」與「台灣自治會」，「台韓同志會」。(三)廈門的「台灣尚志社」，「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與「廈門中國台灣同志會」。(四)南京的「中台同志會」。(五)廣東的「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

由上述可知，海外的台灣留學生，尤其是在祖國薰陶下的青年們，民族意識的覺醒以及革命組織的紛紛成立，不僅意味著他們反日思想的萌芽，更顯示出他們推翻日本暴虐政治的決心，他們的抗日行動，在精神上是與本島聯成一氣的，在力量上，是直接或間接受到 國父的感召，與祖國的國民革命運動結為一體，聲息相通的。

## 二、血濃於水——文化及思想上的影響

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苛稅暴政，可謂罄竹難書，台灣同胞憤於日人的暴政壓迫，更由於民族精神的保存與愛國思想的發揚，加上祖國辛亥革命成功的刺激，故掀起了連串如火如荼的抗日浪潮，其中有武裝革命運動，也有思想文化上的鬥爭，雖然犧牲慘重，史不絕書，但充分顯露出台灣與祖國大陸之間休戚與共、血肉相連的民族感情。

國父是最早決心以實際革命行動恢復台灣的偉人，他宣揚三民主義，這種革命理論，經由多種管道，滲入台灣同胞腦海之中，對台灣同胞文化思想及政治社會之影響，自是十分深遠。除 國父外，中國國民黨的元老們也無不殷殷以規復台灣為志，他們或用言語，或用文字，不時表達對台灣同胞的關切，並啓發台灣同胞革命奮鬥的方向，對台灣志士們所倡導

的民族革命與社會運動，都曾發生積極的指導作用。

「台灣民報」是日據時期唯一由台灣志士所辦，用漢文出版，為台灣同胞喉舌與民族運動言論機關的報紙。從事台灣民報運動的革命志士，大都和中國國民黨有來往，並且受到國民黨的支持，民國十七年，黨元老李石曾寫了一篇「現今革命之意義」的文章登在第一七五號的台灣民報上，雖然全部內容被日本當局檢扣到只剩下一個標題，但所發生的無形影響仍是深遠的。民國十九年一月，教育界名流蔡元培又為台灣民報題了「喚起民衆」四個大字，暗示革命組織的方法與奮鬥的方向，希望激發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鼓吹台灣的民族運動。民國二十年，國民政府的考試院長戴傳賢，又為該報親題「血濃於水」四個字，含意深遠，不但指明了台灣同胞與大陸父老間分不開、斬不斷的血緣關係，也隱含了藉此激發同胞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情感的強烈希望。因此，台灣同胞的民族精神與愛國思想，乃得以不絕如縷，連綿不輟，從台灣淪陷開始，這種「血濃於水」的故國之思，便源源不絕的以各種方式表達出來，其中較顯著的有：

(一)愛國史學家連橫著「台灣通史」、「台灣詩乘」、「台灣語典」、「劍花室詩集」等書，保存了民族精神，宏揚了民族志節，也激勵了台灣同胞的愛國精神與抗日決心。民國成立，連橫到祖國大陸後甫回台灣，寫下不少作品，茲舉其「大陸詩草」詞一首：「三月三，春秋禊。五月五，湘纍祭。九月之九作重陽，何如十月之十國民呼萬歲！萬歲呼！甘馳驅，武昌一戰誅東胡，共和之國此權輿。嗚呼！共和之國此權輿，慎勿內訌外侮爲人奴！」（壬子十月十日）在作品中鮮明地表示對於國民革命的信心與期待。我們可以了解，對於連氏後半生的思想行藏，國民革命運動確是具有重大的影響。

(二)民族鬥士丘逢甲於抗日失敗內渡後，設立嶺東同文學堂於汕頭，啓發學生的民族觀念與自由思想，成爲革命思想的播種者。他在廣東辦學先後十年，廣東的革命志士如鄒魯等，多是出自其門下，民國二年，臨終時遺言：「死了必須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記台灣。」丘逢甲不僅是愛國志士，而且是愛國詩人，他自台灣返歸故鄉後，在故鄉所築之廬取名念台，又將他的公子也命爲念台。凡是所作的詩文，都是署名爲倉海君，是取留侯見倉海君，得力士椎秦之意，以示不忘復仇復台。詩如其人，現存有「嶺雲海日樓詩鈔」、「台灣民主國義軍大將軍倉海先生丘逢甲詩選」、「丘倉海先生念台詩集」等數種，大多是蒼涼慷慨悲壯之作，而且有三分之二左右是懷念台灣或與台灣有關的。台灣光復後，台灣同胞爲懷念丘逢甲抗日護台的義舉，各地且多以他名字作爲路名或校名，如逢甲路，逢甲大學等，以紀念他的不朽英名。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志士的抗日運動，同時注意到非武力的政治鬥爭，他們暫時放棄了武力的抗暴，但與祖國的聯繫則不曾中斷。民國十年的「台灣文化協會」，民國十二年的「台灣議會期成會」，民國十六年的「台灣民眾黨」，民國十九年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是這一時期台灣同胞對異族統治者極力爭取自由民權的具體組織，他們要求漢文教學，集結詩社以寄故國之思；他們要求廢棄渡華的限制，甚至直接潛返祖國接受教育，而領導這些團體運動的台胞志士，與祖國「血濃於水」的感情又是顯而易見的事。例如：台灣名紳林獻堂之政治運動，主要是受國父的左右手戴季陶等之影響與啓迪。蔡惠如、彭華英、林呈祿之被稱爲「祖國派」，他們的政治活動極力與中國國民黨取得聯繫，楊肇嘉自謂五十年間心向祖國；蔣渭水之明揭民族主義，響應祖國國民革命，他所領導下的「台灣民眾黨」所提出的三大政治綱領，實際上就是三民主義的翻版。史學家連橫以著述詩文，啓發台胞民族意識，復以不忍軒黃華胄爲異族賤奴，而有托子張繼之舉。乃至於文化人莊遂在日據時期以「唱平劇、結詩社、寫毛筆字，做一兩件長袍」以存故國之思，表現本來面目的感人故事；（註十八）在在都表示出了台灣遺民的內心深處，無不受到國父國民革命的影響，我們由「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論述台灣的「民族革命運動與中國特殊關係」中可以得到明證：「（民族）革命運動之進行，皆與中國革命或中國軍政之要人保持密切聯絡，其第一特質，就是思想之傾向或背景，都立在三民主義，尤其是民族主義。……此種革命運動中，置策源地於中國者，例受中國軍政要人直接之指導與援助。」（註十九）

### 三、返本歸宗——抗日運動迭起，冀望重回祖國懷抱

中日甲午一戰，終而造成「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丘逢甲語）的悲慘割台局面。然而被異族君臨整整五十年的台灣同胞，他們在這半世紀裡，一心所繫念不忘的，仍是他們的祖國，和給他們開拓與建置基業的祖先；一直所保持著的是固有的中華文化，和最純潔的民族血統。台灣同胞早期的武力抗爭，中期的社會政治及文化思想上的運動，和後期在祖國的組織團體進行抗日活動，五十年間的史實，真可以連綴成一幅幅可歌可泣的壯烈史篇。尤其後期的抗日運動，就是爲了「要求光復台灣，期望在民主中國版圖之內，使台灣民眾遵奉三民主義，建設自由、平等、進步、康樂的新台灣。」（同註十八）具體言之，就是要求「返本歸宗」的光復運動。

庚子之年（一九〇〇年），國父首次來台，以台灣為領導惠州之役的指揮部，在台灣停留月餘，起義雖然失敗，而革命風潮，已及於全國，更喚起台胞的民族意識。辛亥革命成功，民國成立，更鼓舞了台灣同胞的民族自尊心及民權民生思想，有志之士，乃奮然而起，民國紀元前，蔡清琳之在北埔，民國成立後，劉乾之在林杞埔、黃朝之在土庫、余清芳之在西來庵，以及霧社山胞武裝革命等，相繼發起武力抗日，此為台灣同胞接受國父領導中國大陸革命風潮的鼓盪所激勵引起的。至於羅福星返台領導國民革命，擔負光復台灣之使命，所引起的「羅福星事件」，尤其是親炙國父革命精神之感召，受到國父革命思想的影響而有之義舉。

苗栗羅福星，祖籍廣東，是台灣抗日革命史上最偉大的英雄，回國之後，加入同盟會，與黨人黃興、胡漢民、趙聲等，過往甚密；曾參加廣州「三二九」之役，倖免於難。武昌起義成功後，奉派前來台灣，號召同志，策畫革命，他的宣傳內容有三：第一：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已經成功，中華民國人人享受自由平等。第二：台灣人民原是中國人民，決無永久屈服於日本之理，必須糾合島內同胞，參加同盟會革命黨，黨員編組為軍隊，相繼而起，逐殺日本人於本島之外，光復台灣故土。第三：舉事時中國革命黨來援，聯合作戰，必定成功，享受三民主義成果。民國二年，他獲得黃興、胡漢民的支持，相傳聚集黨眾已有十多萬人，其中有兩萬人以不同身分來自大陸，可見台灣與祖國的革命已合而為一，惜以規模宏大而事機不密，乃以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淡水被捕，同時被捕株連的有一百數十人。羅福星在獄中受盡脅誘刑求，只說：「我願求一死勿多問！」並寫絕筆書云：「不死於家，永為子孫紀念，而死於台灣，永為台民紀念耳！」（同註十四）革命本色，烈士豪語，不可多得。民國三年三月三日，從容就義，時年二十八歲。臨死前，作「祝我民國詞」曰：「中土如斯更富強，華封共祝著邊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國本苞桑氣運昌。孫真國手著初唐，逸樂中原久益彰；仙客早沾靈妙藥，救人千病一身當。」將「中華民國孫逸仙救」八字嵌於每句之首，足證他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生為中國人，死為中華魂，獻身革命，至死不渝。

前期武裝抗日，既無法達成使命，所以中期以後，台灣同胞乃在政治及文化思想上作為奮鬥的方向。這在本章第一、二部分已敘述。方式、組織容或不同，步調、分子雖甚複雜，但總歸最後目標，則都希望祖國的庇翼下，使台灣同胞早日脫離異族的桎梏；所以他們一方面貢獻自身的力量，致力於祖國的復興，另一方面更寄望於祖國強大後，能出同胞於水

火。「台灣新青年」曾載有一篇宣言，指出：「我們自救的方法，……致力於台灣革命運動，非先致力於中國革命成功不可，待中國強大時候，台灣才有回復之日，待中國有勢力的時候，台灣人才脫離日本強盜的束縛。」（同註二十）因此台灣同胞既有此正確體認，於是從民國十年以後到抗戰，隨著祖國國民革命運動的開展，留居大陸，得免受日寇桎梏的台灣同胞，乃積極馳騁於祖國疆場，致力「返本歸宗」，亦即是「保衛祖國，恢復台灣」的運動和工作了。即如早期之丘逢甲，一生以復台為職志，他的返歸祖國，正是採取「培本榮枝」的策略，先使祖國強盛，然後以祖國的力量，來光復台灣，其後革命志士，亦多循此途徑。七七事變爆發後，留居祖國的台灣志士，立即組團投效抗日陣營，「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台灣革命黨」、「台灣青年革命黨」、「台灣國民黨」、「台灣光復團」等主要團體，爲了結合抗日力量，特別在中央的協助與指導下，拋棄門戶之見，於民國三十年二月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他們誓願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之下，以集中一切台灣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與祖國協力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同註十八）。

「台灣革命同盟會」成立後，在前線，在大後方均積極展開了一連串抗日復台的工作；他們在大後方發動輿情，宣傳並擴大台灣光復運動，他們呈請中央恢復台灣省制，國民參政會設置台籍參政員名額，使祖國同胞深切了解台灣同胞「返本歸宗」的意願。他們發刊「新台灣」、「台灣先鋒」、「台灣民聲報」，作爲抗日復台的宣傳喉舌，收效極大。在實際行動上，他們有一支活躍在閩、浙、皖、贛一帶的「台灣義勇隊」，一支曾經三次奇襲日軍司令部的「行動隊」，都直接投入了抗日禦侮的行列。「台灣革命同盟會」的這些工作，在整個抗戰行動中，或屬細微，但在國民革命史的意義上却極不平凡，因爲台灣同胞也確實分擔了祖國抗日衛國的責任。我們也不得不承認：「返本歸宗」的這個光復運動，促成了八年抗戰勝利後，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也達成了 國父國民革命未竟事業——光復台灣的目標，由此可見， 國父國民革命與台灣，其間關係，真是相互激盪，桴鼓相應，始終如一，未曾間斷。

## 肆、結論

在中國的革命歷史上，台灣始終保持了最光榮、最有意義的地位：洪門會黨、法軍犯台等醞釀了 國父革命思潮。而

九十年前馬關條約的簽訂，寶島的割讓，更激起了國民革命的怒潮，史蹟斑斑可考。而四十年前八年對日抗戰的勝利，台灣的重回祖國懷抱，不但達成了國民革命的第二期目標，更使台灣成爲今日「匡復中華的起點，重建民國的基地。」由此可見，國父及繼志述事的先總統 蔣公所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發動和成功，台灣是一個極重要的樞紐。

從台灣的淪陷到光復，正是一部中國前期革命最艱苦的血淚歷史。國父三度蒞台，也都是在革命最艱難困頓的階段，又多半是國父不見容於國內外其他地方之時，從這歷史事實來探討，台灣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是舉足輕重，是任重道遠的。

時代的巨流，不斷地向前衝擊，今天的台灣，在歷史使命的召喚下，已成爲太平洋上最堅強的反共堡壘，在鐵幕沉沉下呻吟憔悴的大陸同胞，正渴望我們反攻勝利，重光河山，正如同當年台灣同胞渴望「返本歸宗」一般。先總統 蔣公告誡我們：「沒有辛亥的革命，就沒有中華民國；沒有中華民國的八年抗戰，就沒有台灣的光復。」我們飲水思源，應念國父及諸革命先烈的賜予，及大陸同胞八年抗日拋頭顱、灑熱血所換來的果實。

我們深深體認到，恢復台灣原是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奮鬥目標之一；台灣得以重光，乃係先總統 蔣公秉承國父遺志所達成的革命成果。三十多年來我們建設台灣，則又是遵奉國父遺教爲藍圖，以建設成三民主義模範省。今天，我們遙想國父，緬懷先烈，更具有特殊令人興奮的意義。尤其現在的台灣，不僅是反攻復國，民族復興的基地，而且成爲世界反共的燈塔，這是台灣的光榮，也是國父遺留的恩惠，我們肩負培育中興人才，達成教育建國使命的全國教師們，更應深入體認國父國民革命與台灣的深厚淵源，並且利用各種機會，讓學生了解我們這一代責任之重大，以期喚起民衆，團結起來，遵照國父倡導革命精神，在大有爲的政府領導下，一起來完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重整神州第三期革命任務，讓台灣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再創光輝燦爛的一頁歷史。

## 附 註

註 一：莊政，國父生平與志業（台北，中央日報社，民國七十一年版），三四九—三五九頁。



註二：師大三研所暑修班莊政先生「中國革命史」講義。

註三：國父，民族主義第三講，收在國父全集第一冊（台北，黨史會，民國五十四年版），壹—二一頁。

註四：同註三，柒—九〇頁。

註五：莊政，國父革命與洪門會黨（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年版），二四—五頁。

註六：連橫，台灣通史（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六年版），六〇—八頁。

註七：同註一，一一—九頁。

註八：薛光前、朱建民合編，近代的台灣（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六年版），一三一頁。

註九：李守孔，國民革命史（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六十九年版），五頁。

註十：王成聖，孫中山先生與台灣，中外雜誌，十七卷三期（台北，民國六十四年），二二頁。

註十一：曾迺碩，國父與台灣的革命運動（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七年版），一〇〇頁。

註十二：同註一。

註十三：吳稚暉等著，我們的國父（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六十七年版），一六五頁。

註十四：楊寶發，國民革命與台灣（台北，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民國六十五年版），八三—四頁。

註十五：台灣總督府對於台灣的留學生一向不放心，早於一九〇七年即派人監督東京府轄內的台灣留學生，目的當然是為著便於監督起見。參見蔡培

督府在東京小石川區茗荷谷創設「高砂寮」，專門收容台灣的留學生，目的當然是為著便於監督起見。參見蔡培火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社，民國七十二年版），七五頁。

註十六：民國八年三月一日，朝鮮人在孫兼熙領導下，發表獨立宣言，與會人士齊呼「大韓獨立萬歲」。全韓騷動，結果遭日本軍隊鎮壓收平，世稱「三、一事件」。同註十五，八十頁。

註十七：日本據台之年六月三十日以法律六三號公布「關於施行台灣之法律」，承認台灣特殊化制度，台灣總督有權發布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律令」，這是日人統治台灣一切惡法之由來，稱為「六三法案」。同註十五，五三頁。

註十八：呂芳上，從光復台灣到光復大陸，中央月刊，十二卷十二期（台北，民國六十九年），五五頁。

註十九：謝東閔等著，國民革命運動與台灣（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六十九年版），一六二頁。